

直击海外

给留学打上 奥运的印记

本报记者 郑红深



▲丁逸卿（左）同国
际奥委会委员杨扬合影

索契冬奥会新闻中心，左侧咨询台一长排有十来个位置。走到第一个位置前，我听到了中国话，原来这是一个中文服务工位。听到家乡话，我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后来在很多地方，我都会碰上那种熟悉的乡音，大多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或学中文的俄罗斯等国的青年在说中文。比如在“中国之家”，就有来自俄罗斯几个大学的12位志愿者。索契冬奥会共有25000名志愿者，这里讲几个在不同国家留学又同时在索契当志愿者的中国留学生的故事。

为当志愿者 致信俄总统

特别热情的中国留学生丁逸卿给我的印象很深，不光是因为他帮助我办理了很多采访手续，比如我采访为开闭幕式服务的唐晨，须要提前一天办理网上预约手续；更因为小丁来当志愿者有很多传奇故事。

小丁是安徽铜陵人，从小养成服务他人、结交朋友的习惯。3年前，铜陵举办举重亚锦赛，读高二的他就去当英语翻译志愿者。2011年，丁逸卿赴美留学，就读于美国普渡大学航空工程专业。留学期间他更是志愿服务的积极分子。每年学校迎新他都会去，特别是热心为一些来自中国的留学新生提供咨询引导。

这次到索契来当冬奥会志愿者让他费了一番周折。2012年2月冬奥会官网开征志愿者，小丁第一时间报了名，并通过电话面试，但一直没收到索契组委会的回音。2013年3月底，他又被要求接受面试。他本以为马上就如愿了，结果又过了5个月，实在忍不住的小丁给组委会打电话。他对记者说，“因为美国和俄罗斯有时差，半夜为不打扰室友休息，我把自已关在卫生间坐在马桶上给面试官打电话。”这期间，心急的小丁给组委会打过几十个电话，发过上百封邮件，但都没有回复。10月下旬，小丁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办公室写了封信，讲述了申请志愿者的经历。结果，一周后就收到组委会的邮件，他的申请终于通过了。组委会告诉他：“总统办公室已把你的信转给我们了。”

丁逸卿的志愿岗位换过好几个。开始要他在奥运村搞接待，后又换了冰球馆等3个岗位，最后他选择了在主新闻中心做媒体接待。小丁很喜欢这个岗位，每天工作远超8小时，他说：“最多一天在MPC工作了16小时。特别是开幕前几天，媒体都来了，头绪很多，工作量极大，要处理的事情成百上千件，快累趴下了。”

很多不归他管的事情只要找到他，他也热心去做。2月3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主新闻中心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他想到那里去服务顺便见

见巴赫。但他

的岗位不在那里，他只得向更高一级主管申请。刚巧那里正需要中文翻译，他获得了许可。因为中文同声传译临时出了故障，在那里采访的《新疆日报》记者姚彤见着他就像见到了亲人。他帮姚彤给巴赫提问：“像新疆这样冰雪条件好但冰雪运动发展较缓的地方如何改变现状？”巴赫回答说：“北京正在申办冬奥会，我相信，如果成功，将对整个中国的冰雪运动的发展有一个大的推动。”小丁把这些翻译给姚彤，姚彤很满意，小丁也很高兴。

服务开幕式 保驾运动员

来自澳大利亚堪培拉澳洲国立大学精算专业的唐晨，是参加开闭幕式的志愿者。我请丁逸卿帮忙填表申请，采访了他。我们坐在媒体中心二楼的俄罗斯文化茶座里侃侃而谈。

刚刚获得荣誉学士学位开始研究生学习的唐晨，从小就有一个体育梦。要是索契来不了，他还会申请做纽卡斯尔冬奥会的志愿者。索契志愿者网申的过程差不多，但唐晨说他这次能获得这个机会要感谢一个校友、博士生物黄大哥。杨寅在北京就开始争当志愿者，他参加过夏奥、冬奥、青奥等7次志愿活动。当2012年初索契网上招募时，杨寅就鼓励唐晨一起参与。唐晨最后是经过一波三折，迎来柳暗花明，以候补名单进入；而杨寅未能进入，因为杨寅申请的岗位已满，但杨寅依然来到索契，尽量地为冬奥会做些工作。

说起参与开幕式工作，唐晨说得眉飞色舞。他主要是参加跟国旗方阵表演相关活动和运动员入场后的引导。他们250人每人穿着3公斤重的衣服组成飘逸的方阵，每件衣服亮出不同的灯光，从而组成三色或飘动或伸展的俄罗斯国旗。他给我看手机上存着的他在开幕式现场的很多照片，兴奋地一一讲解：怎么通过耳麦接受指令做出动作；怎么协调一致跑步到位；怎么通过游戏训练基本动作；国旗是怎么变化的，等等。他说，排练开幕式真不容易，很投入很辛苦，谁也不愿意有失误。所以有点失误引来众多吐槽，他们觉得很委屈，难以接受。

他说，引导运动员上看台的工作，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彩排时很简单，运动员由志愿者模拟，很听指挥。但实际上各国团队有的人多有的人少；让他们坐成一排，他们却要坐成一团；有个代表团坐了别人的位置，别人就没有座位了；要他们尽快坐好，他们却都要同举牌的礼仪小姐合影。为此真的费了不少口舌。

老家在山东东营的唐晨是1月16日告别父母从北京飞往索契的。他没在家里同父母一起过年，除夕那天下雨，几个来自中国的志愿者一起相聚。说到这里，他有些停顿和哽咽。但他父母对他的志愿行动非常支持，他们知道唐晨从小就是个体育迷。悉尼奥运会时，10岁的他天天守着电视看直播。这几天，他父母每天都关注着冬奥会，那天从电视直播中在花滑滑冰馆看见了儿子的身影，马上就兴奋地打电话给唐晨。

谈到感受，这几天正忙着闭幕式彩排的唐晨说，结识了朋友，收获了友谊，更体会到无私奉献精神。有个朋友每天忍受着背痛工作，纯粹是因为对开幕式表演的热爱。他说：“经历这么一次奥运会，不仅使我这个体育迷跟体育有个零距离接触，更重要的是学会了不计回报地付出，再苦再累也快乐。”

热心为他人 享受相聚时

那天我要去“中国之家”，听说路途遥远且不好走，我就请教新闻中心咨询台的姚波，她也说不清，带我去找了一个熟悉地理的俄罗斯志愿者。通过来回的翻译，

我

终于搞

明白了。

我要采访中国志

愿者，姚波立刻带我去

申请台帮我填写预

约表，后来又将我希

望采访的

志愿者的微信联系方式

发给我。看上去总是

笑眯眯的姚波，

就是这样

一个热心的女孩。

姚波在给我的

微信中述说了来索

契当志愿者的激动：“1月18日，经过

36个小时的旅程，我从圣彼得堡来到了

俄罗斯的黑海明珠索契。来车站接我们的

工作人员在去住处的路上一直在兴奋地描述

我们即将开始的新生活。看到路边按大洲

名的五环，我暗暗对自己说：冬奥会，我来了！”

在圣彼得堡大学上学一年半的姚波，是第一

次参加这样大型的活动。前台咨询工作对她也是

一种挑战，需要大量的信息储备，即时的语言转

换。她说，好些人因为她这个亚洲面孔的孩

儿可以用基本没有口音的俄语交流而十分惊奇，她感觉很

自豪。来自各国的志愿者都以奉献精神感动着自己和

大家。她告诉我，信息台不光是脑力劳动，也有体力

劳动。为媒体记者装3000个纪念背包时，大家开玩笑

说，这个打包现场就是一个“中国工厂”。

索契有专门的志愿者村，在这里，他们有新鲜的生活，

奇异的体验。姚波对我说：“我们在志愿者村4人住

一间房。我的室友是两个俄罗斯女孩和一个瑞典女孩

儿，她们都很开朗。来到阿德勒好多天都没有看到中国

人，没有机会讲中文。每天从一睁眼到睡觉，大脑随时

都要在俄语和英文之间来回转换，于是，我开始了没有

汉语的生活。以至于后来看到同胞的时候，感受到了从

来没有过的亲切。”

姚波对我说，这次志愿工作是她非常宝贵的经历。

因为冬奥会，才有机会享受索契的沙滩、阳光、空气，

还有温暖的冬天；也因为冬奥会，才有机会和来自

世界各个国家的志愿者成为朋友。他们团队的负责人

是位细心的领导，不论是志愿者的生日，还是中国志

愿者的春节，都会别出心裁地为大家庆祝。她说，

那天她们组的德国女孩儿工作结束，返回德国。分

别时大家依依不舍，相约在以后的奥运会中再相

聚。姚波也希望在两年后的里约夏季奥运会、4年

后的平昌冬奥会还有机会去当志愿者。

后，还剩下150法郎。

最难得的是工余之外还有了正常的享

受。有一次，邓小平为了看一场国际足球

比赛，狠下心，花了5个法郎买了一张最便

宜的门票。

橡胶厂有40多个中国学生。工厂搭了

一座木棚，作为他们的栖身之地。就是在这个工棚，邓小平认识了蔡和森、周恩来

等革命者。

1923年6月，邓小平被选入旅欧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在开始革命生

涯后不久，他就得到了一个雅号：油印博

士。这从许多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中都能

看到，主要是因为邓小平非常认真地在

蜡板上刻写旅欧支部的半月刊《赤光》上

的每一篇文章，并且负责油印工作。有时

候，邓小平也为《赤光》撰写文章。

留学素描

走在埃及开罗大学的校园里，修蕊流行了。泪水的来由非悲非喜，仅仅是一种生理反应。

“选择不因局势动荡而退却”

“示威游行大部分在学校外面，对学生影响不大。”修蕊平静地向笔者讲述，“有一次在做论文提纲答辩的时候，外面开始游行。还有一次我正在大学图书馆学习，又遇到游行。”

2012年9月，修蕊来到开罗大学文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当时，埃及的局势并不稳定。在“非常时期”的异国求学经历里，当地的示威游行令她印象深刻。

学生游行的事发地点往往在校园里面，而修蕊的泪水正是源自“不由分说便迎面而来”的防暴辣椒水，即催泪瓦斯。“学生游行时，警察会进驻到学校里。”

谈及留学选择，修蕊直言，“神秘的”埃及是学习阿语专业的学子们“最向往的地方”。而大三时在突尼斯做交换生的经历也促使她坚定了自己的选择。“自己选择的路不能因为局势动荡就退却了。”修蕊一笑。

“千塔之城”的简单生活

“做好心理准备也就不觉得苦了。”在突尼斯一年的生活经历帮助修蕊很快地适应了新的环境，“说实话，这次出来并没有感觉在异国，很习惯。”

住合租的公寓，乘巴士上学，课余时间看美剧当消遣，周末去在当地工作的朋友家串门聊天，修蕊的留学生活日复一日地简单重复。即使是春节，也不过是“到中餐馆吃顿饺子”。

修蕊：

“非常时期”的 埃及留学之旅

穆宏远



作为留学生，修蕊亲历了当地的宗教文化。“斋月里，白天街上没有人，夜里开斋以后人们才开始活动。开斋时，清真寺或者富人家门口会摆几张桌子，给穷人、路人准备开斋饭。街上也会有免费的食物和饮料发放。”

在开罗，宣礼塔是随处可见的建筑。修蕊耳边清晰而准时的“宣礼声”提示着城市里的居民做礼拜的时间。修蕊觉得，在对祖国的“亲身体验”和“感性认识”对语言学习的帮助是无处不在的。

“标准语”和“方言”

“平时说‘标准语’会被笑话，但是‘方言’又不会说。”据修蕊介绍，阿拉伯语分为“标准语”和“方言”，“方言”迥异于常用在正式场合及书面的“标准语”。

4年本科，3年研究生，修蕊虽然在国内经历了7年的阿拉伯语学习，但“方言”的存在仍然给她造成困扰。“文学院本科是用‘方言’授课。研究生毕竟人数少，在办公室上课，老师应我们这些留学生的要求尽量用‘标准语’讲课。课堂讨论则完全用‘方言’，很难听懂。”

“虽然有时上课会听不大懂，但是只要学习态度好，多追问，就会渐渐被老师重视，同学们也很愿意提供帮助。”与身边的人日渐深入的交往，让修蕊体会到了他们的温暖，“阿拉伯人很热情，老师课下会直接把我的本子拿过去帮我写一些笔记，同学们下课也会借给我课堂笔记，并为我解答问题。”

在校期间，修蕊选修了文学方向的专业课，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等。“每门课期末都会有论文作业。”在一个月之内完成10页的学术论文带给修蕊的不仅是“痛苦的修行”，更是“真切切的语言水平的提高”。

毕业在即，短暂的寒假里修蕊顾不上休息，积极地与她的导师沟通，投入到毕业论文的写作之中，享受着最后一段“苦中作乐”的留学时光。



▲唐晨在冬奥会



▲姚波在冬奥会

本文图片均由志愿摄

百年留学 邓小平：

留学岁月和“油印博士”

熊建

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1904年—1997年）和其他近200名勤工俭学学生，从上海坐船驶往法国。抵达后，他被送到法国西部诺曼底的巴耶中学，补习法语。

按照原定计划，他们将在掌握了充分的法语知识之后，再学习正常的中学课程。但是，邓小平在这里只读了5个月的书。为什么？没钱了。

为谋生，1921年4月，邓小平来到一家名为施奈德的钢厂工作。他的雇佣登记卡片上注明，日工资是6.6法郎，比学徒工还低，一个星期至少要工作50个小时。

邓小平在施奈德工作时是当翻砂工或去“拉红铁”，戴上石棉手套，将火红的钢板拉出来轧钢，再通过传送带，把沉重而炽热的钢板运到车间的另一处。同学王若飞在日记中写道：“连日天气甚热，厂中尤

为干燥，遍地都是泥沙，大风过处，沙即腾起，着手面上，为汗水所粘，偶一拂拭，其状怪丑怪可笑。”

干了3个星期，邓小平辞职。后来他到巴黎东南约100公里的一个城镇的橡胶厂工作。在此，邓小平做的活很简单，就是把鞋子的各个部分粘合起来。工资每日10法郎，星期日休息，星期六只做半天工。每月净收入为240法郎，付出90法郎伙食费之